



大学经典

#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撰

吕思勉评

李永圻 张耕华 导读整理

# 文史通义

[清] 章学诚 撰 吕思勉 评

李永圻 张耕华 导读整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通义/(清)章学诚撰;吕思勉评;李永圻,张耕华导读整理.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大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25 - 5042 - 5

I. 文... II. ①章... ②吕... ③李... ④张... III. 文史—研究—中国—清前期 IV. K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5173 号

---

责任编辑 谷 玉

装帧设计 陆智昌

---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 撰 吕思勉 评 李永圻 张耕华 导读整理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mm 1/16  
印 张 22.75  
插 页 4  
字 数 396 000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5 - 5042 - 5/K · 1122  
定 价 34.00 元

文史通义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昝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昝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

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势而为，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

“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 文 史 通 义

# 导读

李永圻 张耕华

## 一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清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区）人。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享年64岁。章氏的一生，几乎与乾隆皇帝（1711—1799）的在位之年（1735—1796）相始终。乾隆在位的半个多世纪，正值清朝的“盛世”，但是，生逢“盛世”的章学诚，始终没能分享到“盛世”的恩泽，而在穷苦潦倒、颠仆坎坷中终其一生。

大约在十二世纪末叶，章氏的祖先由福建移居到浙江会稽偁山南的道墟（今上虞市道墟镇），到乾隆年间，道墟的章氏家族已有万余人。约至康熙中期，章学诚的父亲把家从道墟迁居绍兴府城南门的善法弄。父亲章鑣是乾隆丙辰年（1736）举人，六年之后（1742）又中了进士。其后十年，由于仕途壅滞，章鑣一直在吏部候选，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才谒选为湖北应城知县。也是在这一年，14岁的章学诚连“四子书”还未读完，便在父母授命下与一俞姓女子成婚，告别了他生活了十四年的善法弄，跟随父母举家迁居到应城。章鑣为官清廉，任知县职仅

五年，辄因疑狱判决过轻被罢官，穷苦得竟无盘缠返乡。其后十年余，章镳一直在天门、应城等地的书院，以讲学维持生计，最后客死于应城。

章学诚的启蒙老师是母亲史氏。史氏出身于会稽的一个官宦人家，父亲史义遵曾任安徽颍州知府。章学诚7岁时，母亲便教以《百家姓》。幼时的章学诚体弱多病，一年之中“大约无两月功”，且“资质椎鲁，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章氏遗书》卷二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其后，父亲请来江夏生员柯绍庚，专职教授他经义时文，但章学诚仍是“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章氏遗书》卷九《家书六》）。不过，幼年的章学诚虽不善时文，却已萌发对史学的兴趣和才能。十六七岁时，他“突发奇想”，计划将《左传》、《国语》等史籍改编成一部纪传体的《东周书》，此项计划花去他三年的时间而最终仍未能编成，且被柯先生斥为不务正业。但此次编撰实践，激发了他的自信。他自信自己于史学“盖有天授”，常“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章氏遗书》卷一七《柯先生传》）。20岁后，他真切地感悟到自己正处于学问道路上的转折点，自云：“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章氏遗书》卷九《家书六》）

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十七年（1762），章学诚两次北上参加顺天乡试，都告落选。乡试未果，他便进入京城的国子监读书。此时的他，涉世未深，年少气盛，屡遭挫折，为他人所鄙视。他后来回忆说：“始余入监舍，年方二十有五，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艰也。然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决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不过五七人而已，余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余人齿，同舍诸生，视余

若无物。每课榜出，余往覩甲乙，皂隶必旁睨笑曰：‘是公亦来问甲乙邪？’”（《章氏遗书》卷一九《庚辛之间亡友传》）乾隆三十年（1765），章学诚第三次参加顺天乡试，同考官沈业富将他的文章推荐给主考官，但仍未录取。经沈业富的介绍，章学诚始从翰林院编修朱筠问学。他曾与朱师语及举业难学的苦恼，朱师说：“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章学诚无奈地说：“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朱师又说：“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科举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不学时文之咎也。”（《章氏遗书》卷二九《与汪龙庄简》）章学诚虽不喜时文，然因生活所迫，又不得不走举业、入仕的道路。三年后（1768），章学诚第四次应试，仅得了副榜。考官朱棻元见章学诚的对策言《国子监志》编撰义例的得失，叹为佳作，埋怨国子监的教官何以遽失此人。原来章学诚在国子监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在编撰义例上与国子监祭酒陆宗楷发生过争论。陆氏正是此次乡试的主考官，他虽欣赏章氏前二场的作文，但见第三场的策论与自己的见解不合，遂斥落为副榜。可见，章学诚科举应试、屡屡落选，不是他学识不具，而是与主考官所好不合，与当时学界的风气时好向背。

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学诚乡试中式，次年参加会试，考中进士。自23岁第一次应科举考试，其间七应科场（乾隆三十九年，曾赴浙江乡试，未中），终于在41岁时考中了进士。然而，此时的章学诚，对于科场的成败得失，已不甚介意。他曾自云：“登第在四十外，则命使然。”（《章氏遗书》卷二九《与汪龙庄简》）而“科第自是君家旧物，偶然得之，虽亦足以快意，然亦何必振矜如非常之获”（《章氏遗书》卷二九《与王春林书》）。他自忖自己的性格及为人处事的主张，都与当下的社会格格不入，最终放弃了仕途，遂以教书、撰述终其一生。在其后的二十余年里，章学诚辗转主讲于直隶、河南等地

的多所书院：直隶肥乡的清漳书院（44岁）、直隶永平的敬胜书院（45—46岁）、保定的莲池书院（47—49岁）、河南归德的文正书院（51岁）等。主讲的时间长则二至三年，短则一年，甚至不足一年。期间，他也一直应地方官员之聘编修各种方志，或为之整理编撰各种文稿、宗谱等。教书、著述的生活甚为艰辛，且受尽寄人篱下的滋味，以至于“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章氏遗书》卷二九《与史余村论学书》）。

乾隆五十三年（1788）冬，章学诚失去了归德文正书院的讲席，以书院讲学来谋生的日子从此结束。先是在好友裴振的帮助下，章学诚将家眷安顿在安徽亳州，自己去太平为安徽学政徐立纲编修宗谱。不久，又至开封投奔河南巡抚毕沅，凡五年，襄助毕沅编撰《续通鉴》、《史籍考》、主持《湖北通志》的修撰等。自父亲去世之后，章学诚便将家眷从湖北应城迁到北京，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其后，章氏家眷便随同他一起各地迁居：从北京到永平，从永平到保定，从保定到归德，从归德到安徽亳州。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飘泊在外三四十年的章氏家眷，才从亳州迁归会稽故里。不久，毕沅调任湖广总督，章学诚也返回家乡会稽，与他一同回归故里的是历年积存的二万余卷藏书。面对这些跟随多年的卷轴书籍，他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书之为余有者，乃亦如余身，驰驱南北，登涉水陆，往复不啻万里，备极劳倦，不知何日得以楼藏架插。春秋佳日，随意舒卷于明窗棐几间，发千古之秘珍，快心知于独对也。”（《章氏遗书》卷二二《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录》）这些藏书见证了章学诚四十余年辗转迁移、奔波劳顿的生活，“从此著土，不复迁也”（《章氏遗书》卷二二《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录》）。然而，章学诚仍不能“随意舒卷于明窗棐几间”，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再次奔波求救于师长朋友之间。嘉庆元年（1796），章学诚先去扬州为业师沈业富编修家谱。嘉庆二年（1797），去安徽桐城校阅府试试卷。期间，又去湖北、杭

州，为续修《史籍考》奔走呼吁。晚年的章学诚双目失明、两耳重听，但仍口述笔录，著述不辍。他回想自己，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藉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态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而自身不获一试时服”（《章氏遗书》卷二九《与宗族论撰节愍公家传书》）。嘉庆六年（1801）的十一月，一生忙于为他人编书、校书的章学诚，来不及将自己的著述整理编定，就在贫病交加之中与世长逝。

## 二

嘉庆六年（1801），章学诚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临终前数月，他将毕生所著的文稿交给好友王宗炎，嘱托他校定整理。章学诚一生著述颇多，主要的著作有《文史通义》、《校讎通义》、《史籍考》，以及主持编修的《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与他一生的坎坷颠仆相似，章氏的这些著述也多亡佚散失，命运多舛。

章学诚的治学旨趣，是要系统地反思古今文史著述，考其学术源流，详其利弊得失，而成一家之言。他立下志愿编撰这部《文史通义》，当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之前。这一年，35岁的章学诚第一次向学界吐露了著述这部书的计划，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也说到自己正着手编撰《文史通义》一书，计划分内、外、杂篇。说书稿“草创未及什一”，仅随信抄录三篇，以求教匡正。然而，迫于举业和谋生的压力，章学诚一直无法集中时间、精力来撰写这部著作，逐年写成的文稿，也只是命人抄写眷录，题名如《癸卯通义草》、《故孰夏课》、《丙辰山中草》等。嘉庆元年（1796），章学诚在历年积稿中选取了二十余篇，自刻《文史通义》一册，分送友人传阅。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已者诟厉。

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按章氏的计划，将来还要对这些文稿做一番整理编定。他在《跋丙辰山中草》中写道：“所草多属论文，是其长技，故下笔不能自休。而闲居思往，悼其平日以文墨游，而为不知己者多所抵牾，而缪托于同道也，故其论锋所指，有时而激，激则恐失是非之平，他日录归《文史通义》，当去芒角，而存其英华，庶俾后之览者，犹见其初心尔。”（《章氏遗书》卷二八）此时是作者去世前五年，但他仍无法腾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写完并整理这部著作。《浙东学术》一篇，在作者逝世前一年才完成，而酝酿多年的《圆通》、《春秋》等篇，最终仍未撰成。《文史通义》既未最终完稿，作者生前也未写定篇目。这就给“章学”研究留下了一个难题：《文史通义》究竟该包含哪些篇目，这些篇目究竟该如何编排，至今未有定论。

与《文史通义》合称为“章氏双璧”的是《校讎通义》。这是一部讨论校讎学的著述，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校讎学的目的、任务，校讎学的起源、流变，并在总结前人的校讎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新设想、新主张。此书的雏形是《校讎略》，作者原意是置于《文史通义》的外篇，故《诗教》的自注多有参见外篇《校讎略》等语。随着研讨的深入和写作思路的开拓，《校讎略》的内容越来越多，以至可以自成一体、独立成书。乾隆四十四年（1779），《校讎通义》四卷撰成。两年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三月，章学诚去游河南，归途中遭遇盗贼，尽失囊箧及生平所撰著，凡“四十四岁以前撰著，荡然无存”（《章氏遗书》卷二九《跋酉冬戌春志余草》），《校讎通义》四卷稿本也在其中。此次遇盗，损失极大。此后，章学诚每有撰述，必录副本，以备意外丢失。《校讎通义》前三卷幸得有朋友的抄录，章学诚后来重新誊录，并加以校订编定，这便是今日通行的《校讎通义》三卷本。唯此书的第四卷不可复

得，终成一大遗憾。

早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27岁的章学诚便参与其父主持的《天门县志》的编修，还为其父代拟了《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一文，阐述了他在方志编撰义例等方面的见解。其时，章学诚颇想通过志乘的编撰来实践他的史学思想，他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臣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本书卷八，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天门县志》后为他人删改，今之所存，已非当年的原貌。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学诚应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撰《和州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方志理论来编撰的一部志书。《和州志》设纪、表、图、书、传诸体，历一年而编成。但志成而知州换人，后任知州对志稿不满，遂不得刊印。章学诚只得将志稿删存二十篇，题曰《志隅》，今存于《章氏遗书》外篇，而《和州志》原稿遂不可复见。近年有学者在《历阳典录补编》中发现有《和州志》章氏残稿三十多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应永清知县周振荣之延请，章学诚主持编撰《永清县志》，历二年而志稿成。《永清县志》的体例大致与《和州志》同，唯增设《文征》五卷，用以收录奏仪、证实、论说、诗赋、金石等。章学诚编修的诸多方志，唯一能完整刊印并传存于今就是这部《永清县志》。不久，章学诚受亳州知州裴振之聘，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编成《亳州志》。

《亳州志》的编撰十分顺利，章学诚对此《志》也颇为自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此志拟之于史，当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最上乘也。……后世是非，终有定评，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

（《章氏遗书》卷九《又与永清论文》）可惜，志书编完的当

年，裴振即离任，志稿也未能刊印。两年之后（乾隆五十七年，1792），章学诚应毕沅之命主持修撰《湖北通志》，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编成。是年清高宗巡幸天津，毕沅入觐，行前将《通志》事托付给湖北巡抚惠龄。惠龄不满志稿，督府门客也群起而批驳志稿不当。不久，毕沅坐事降补山东巡抚，《湖北通志》也终未能刊行。除了章学诚所保存的部分志稿二十四卷，及后人收录的未成稿一卷外，其他志稿大都散失。八十多年后（1882），张之洞主持重修《湖北通志》，曾悬赏征求章学诚的志稿而终不可得。在主修《湖北通志》期间，章学诚还编撰过《常德府志》、《荆州府志》，后来也都散佚不传。

《史籍考》是一部目录学的著述，也是一部史籍工具书。乾隆五十二年（1787），章学诚得到毕沅的支持，在武昌开局编撰。其后，书局的编撰随毕沅仕途的沉浮时停时续，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史籍考》已完成十之八九，毕沅因湖北教案奏报不实，降补山东巡抚，编撰工作再次中辍。不久，章学诚获得浙江巡抚谢启昆的支持，续编《史籍考》。嘉庆四年（1799），因受和珅案的牵连，已去世两年的毕沅被革去功名，受此影响，《史籍考》的编撰再次中断，其后便不了了之。四十余年后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泾县潘锡恩对《史籍考》再作增补，两年后完成的清本还未付印，便遭咸丰六年（1856）的战火而烧毁。烬余的《史籍考总目》等零星残篇，现收录在《章氏遗书》中。

除上述著述外，章学诚生前编撰、或参与编撰的著述还有多种。其中除《明史列传人名韵编》今已不传外，尚有《文学》（今存一篇）、《续资治通鉴》（毕沅主编）、《历代纪年经纬考》、《历代纪元韵览》以及多种文史札记等。章氏的大部分遗稿，现都收录于《章氏遗书》中。

### 三

康乾之世，学界的主流是考据学，大多数学者，都把治学重心放在古籍的整理和考订上，用作古籍整理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辨伪学、版本学等极为发达。康乾学风，固然是对宋学空谈义理的反动，也是受制于当时文化专制压迫下别无出路的逃避。章学诚既反对宋学的空疏浅陋，也反对当时埋头古典、专务考索，提出学问研究必须“经世致用”。《文史通义》开卷第一句就曰：“六经皆史。”章学诚认为：六经都是先王的政典，是保存先王制度的史书，“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本书卷五，内篇五《浙东学术》）。他既批评宋明理学的“义理明道”，也反对当时学者的“训诂明道”，认为“道以事见”，岂可托之空言？所以“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本书卷二，内篇二《原道中》）。故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学者不可“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浙东学术》）。

章学诚的治学旨趣与当时的风尚大相径庭，他不善于做考据研究，而倾心于文史评议，时人把他比作唐朝的刘知幾，而他却强调其与刘氏的不同：“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章氏遗书》卷九《家书二》）所谓“史意”，就是史家在历史撰述中寓含的自己独创的思想或者理论。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本书卷三，内篇三《史德》）“事”是历史事实，是历史著述的材料；“文”是表述形式，是历史编撰的技巧；而“义”最为重要，它是历史著述的灵魂。章学诚把